

农户时间与土地资源配置研究

——以湖北劳动力转移为背景

罗芳◎著

将社会性别意识决策主流化，
公共政策的阳光普照城乡每一
类人群。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013062164

F323.6
39



罗
芳
◎
著

农户时间与土地资源配置研究

——以湖北劳动力转移为背景

本著作作为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二五”规划资助课题。同时获得黄冈师范学院应用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资助。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70133

F323.6
39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户时间与土地资源配置研究——以湖北劳动力转移为背景/罗芳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622-5910-7

I. ①农… II. ①罗… III. ①农户—工时利用—研究—湖北省
②农户—土地资源—资源配置—研究—湖北省 IV. ①F323. 6
②F323.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7639 号

农户时间与土地资源配置研究——以湖北劳动力转移为背景

© 罗芳著

责任编辑: 向力

责任校对: 王胜

封面制作: 胡灿

编辑室: 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 027-67863220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67863040 (发行部) 027-67861321 (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 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280 千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1 绪论	1
1.1 引言	1
1.2 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综述	4
1.3 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25
1.4 研究的结构	27
上篇 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家庭时间配置与劳动供给	
2 家庭分配模型文献综述	31
2.1 共同偏好模型	31
2.2 合作博弈模型	33
2.3 非合作博弈模型	35
2.4 威胁点的决定因素	38
2.5 结束语	39
3 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	40
3.1 数据和方法	41
3.2 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与时间的描述性统计	42
3.3 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概率与时间的回归分析	45
3.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49
4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意识	51
4.1 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	51
4.2 公共政策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意识问题	52
4.3 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意识分类体系	53
4.4 实证分析	54
4.5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60
5 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已婚女性的时间配置	62
5.1 理论模型	62
5.2 经验分析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	65
5.3 数据和方法	66
5.4 Tobit 模型估计结果	68

5.5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72
6	贫困农户的劳动供给曲线	73
6.1	研究背景	73
6.2	理论框架	74
6.3	实证分析	77
6.4	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81
6.5	与已有研究的比较	82
7	影子工资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84
7.1	影子工资理论回顾	84
7.2	影子工资的测算方法	86
7.3	影子工资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92
7.4	结束语	94
8	影子工资在农户劳动供给估计中的应用	96
8.1	理论模型	97
8.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00
8.3	影子工资和影子收入的估计	101
8.4	农户劳动供给函数的估计	102
8.5	边际产出与实际工资等式的检验	106
8.6	主要结论	106

中篇 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农户兼业与土地资源配置

9	基于配置效应、兼业效应和投资效应的兼业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分析	111
9.1	引言	111
9.2	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影响的微观机制分析	112
9.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14
9.4	模型与变量的选择	117
9.5	估计结果分析	118
9.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21
10	土地细碎化和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123
10.1	引言	123
10.2	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	124
10.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25
10.4	模型与变量选择	127

10.5	回归结果分析	130
10.6	重点结论与政策建议	133
11	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文献综述	135
11.1	地权稳定性与耕地可持续利用	136
11.2	耕地占补平衡机制	137
11.3	土地整理与耕地可持续利用	139
11.4	农户水土保持行为的影响因素	140
11.5	耕地保护的已有法律体系及其重构	141
11.6	国际比较	143
11.7	有待发展的研究方向	146
12	农户兼业水平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分析	147
12.1	引言	147
1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49
12.3	模型与变量的选择	150
12.4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153
12.5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57
13	非农就业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影响的理论分析	159
13.1	农业生产函数	159
13.2	家庭效用函数	160
13.3	模型的建立	161
13.4	结论	164
14	劳动力迁移、土地流转和土地调整的资源配置效率	166
14.1	劳动力迁移、土地流转和土地调整的现状	166
14.2	农户劳动生产率不同时三种资源配置效率的比较分析	168
14.3	农户劳动生产率相同时三种资源配置效率的比较分析	172
14.4	结论与启示	176

下篇 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农业机械化与可持续发展

15	农业机械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联度分析	181
15.1	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181
15.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	186
15.3	结论	187

16	机械化对农业社会总产值增量的贡献率分析	188
16.1	引言	188
16.2	农业机械化的贡献率的理论分析	189
16.3	农业机械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193
16.4	结论	196
17	低碳农业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197
17.1	低碳农业的缘起与概念界定	198
17.2	低碳农业与农产品安全	199
17.3	低碳农业技术体系的构建	200
17.4	低碳农业的生态产业链与发展现状	201
17.5	结论	202
18	湖北低碳农业发展现状与前景研究	204
18.1	低碳农业发展的分析框架	205
18.2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207
18.3	回归结果分析	207
18.4	各因素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	209
18.5	湖北低碳农业发展前景方略	210
19	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模式分析	213
19.1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概念	213
19.2	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基本框架和过程分析	214
19.3	京山县的自然资源条件	216
19.4	京山县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216
19.5	京山县生态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经营模式	217
19.6	京山县发展生态农业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	220
20	结论性述评	222
20.1	全书的结论性述评	222
20.2	研究的不足之处	224
20.3	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	225
	参考文献	226
	附 录	247
	附录1 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问卷调查	247
	附录2 农村家庭劳动供给问卷调查	249
	附录3 农村已婚女性时间分配问卷调查	250

1 绪论

1.1 引言

世界各国经济结构中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变化是妇女进入劳动市场。以美国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20世纪的前40年,已婚白人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增长了5倍;从1950年到197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了50%,70年代仍在加速增长(Smith和Ward,1985)。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早期,虽然辍学的女中学生的就业率仅上升了4.8%,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上升了15%;尽管受教育不到12年的女性的年均工作时间仅提高了6%,但受过16年教育的女性的工作时间却提高了12%;女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小时工资提高约16%,而大学辍学女性的小时工资下降约12%(Pencavel,1998)。平均每年有210万美国妇女至少遭受一次家庭暴力(Langan和Innes,1986);大约30%的美国夫妻在他们相处期间有过身体被施暴的经历(Tauchen, Witte和Long,1991)。Smith和Ward(1985)发现,1950—1980年,实际工资增加是女性劳动供给上升的主要原因。然而,1970—1980年,女性劳动供给率上升,而同期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却在下降。Michael提出,这一异常现象产生的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离婚所致(Michael,1985);Peters(1986),Johnson和Skinner(1986),以及Parkman(1992)更进一步解析了离婚率与单方面离婚法律的实施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美国离婚且没有再婚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由1960年的2.3%上升到1981年的6.7%;1970年结婚而后以离婚告终的可能性与1950年相比,可能性上升了60%(Johnson和Skinner,1986);与此同时,美国妇女的生育率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下降了100%(吴桂英,2002)。

上述研究表明,自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历史变革

和转变的同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就业率以及家庭角色等都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必然导致家庭关系结构也随之演进和变更，家庭问题愈来愈凸显，这无疑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与重视，于是家庭经济学应运而生。正如现代企业理论打开了现代企业这只“黑匣子”，家庭经济学也正试图打开家庭这只“黑匣子”。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剩余的国家。这种劳动力剩余不仅仅表现为城市日益显现的失业和下岗，更为重要的是广大农村有一大批过剩劳动力，他们以就业不足的隐蔽性失业为主要特征。在中国现代社会学辞典上，“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雇佣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但通常所说的“民工”，是指离土离乡进城以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农村人口。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束缚下，中国农民形成了重农轻商、以农为本、迷恋土地、固守家园的基本生活信条，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向“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却连续不断地大规模外出寻找就业机会。每年春节过后，都会有大批农民从农村到发达地区城市打工，形成了大规模潮汐式的跨地区转移，被称作“民工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再次出现连续扩大的趋势，农民流入城市的人数迅速增多。在2002年，全国有1.2亿流动人口，跨省流动4242万人，占35%。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是人口流出大省，这6省流出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9.3%。而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等沿海省份和大城市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目的地，其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68.5%。壮观的“民工潮”记录了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向城市流动的轨迹与历程。

毋庸置疑，通观世界历史，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有中国如此庞大，转移的任务有如此艰巨。同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乡村迁移到城市或城镇，这种超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必然会对经济产生强烈的冲击和巨大的影响。这种冲击和影响既是广泛的，又是深刻的，其意义不可低估，但其矛盾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转移数量与质量的错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隐性变为显性状态，庞大的剩余大军顷刻之间在中国形成来势汹涌的转移大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多年出现的“民工潮”则是这一现象的外在体现，少则3000多万人，多则8000余万人，由此引发了交通、治安、食宿、就业安排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引起了有

关政府部门及科研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但转移劳动力素质低下,专业技术人员匮乏,缺乏应有的劳动技能,纪律、法律意识淡薄,难以适应新的就业岗位。

第二,转移空间的错位。由于所获得信息的不完备性,以及发达地区“强光效应”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高度集中在沿海几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和城市。必然导致的后果:一是劳动岗位的供给与需求矛盾加剧,经济发达地区有限的就业岗位难以满足庞大的需求。二是转移效益低下,许多劳动力转移成本高,投入产出比低。由于新的工作收入、环境与期望值相差甚远,或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许多外出者徒劳而返。

第三,转移产业的错位。一是表现在异地转移就业层次上,多为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的建筑、服务行业;二是表现在本地就业产业的同构性。乡镇企业发展由于缺乏有力的指导,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趋同现象极为突出。

第四,转移宏观调控与客观现实的错位。中国缺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管理和法律保障,转移人员、用工单位和输出组织三方的责、权、利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可循,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进而影响到转移的规模、速度和质量。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下,农村家庭不可避免地受其冲击和影响。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约 1.41 亩(陈晓红,2006),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以及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普遍推广和农业机械设施的广泛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值增加并逐渐显化。同时,又因不同于其他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存在着非统一性,不可避免地产生农业劳动力使用的阶段性和间歇性,从而又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季节性劳动力剩余(句芳,高明华等)。这些因素都为农户兼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1996 年年末,第一次中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纯农业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为 59.26%,非农业户的比例为 9.70%,一兼农户的比例为 18.24%,二兼农户的比例为 12.79%,即兼业农户所占比例之和为 31.03%(周英,2010)。1999 年,纯农户比例为 40%,非农户比例为 7%,一兼农户的比例为 37%,二兼农户的比例为 16%,即兼业户总比例为 53%(邹雄,雷忠英,2006)。目前,兼业户总比例已高达 70%(裴劲松,2007)。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已转移了 2 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仍有

约 1.2 亿劳动力有待转移。因此,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兼业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农户的劳动力资源如何在非农行业与农业之间配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家庭经济学这门新兴的经济学分支,无疑为我们分析农户的兼业行为,即农户家庭时间配置问题,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方法和工具。本研究将围绕劳动力转移、农户兼业和农户时间配置等方面展开。

1.2 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户家庭时间配置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下面将从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户兼业问题和农户时间配置模型 3 个方面进行回顾并予以简单述评。

1.2.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有关劳动剩余经济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的理论包括古典主义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理论两大派别。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很明显。

1.2.1.1 第一阶段

由于这一阶段世界各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兴未艾,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理论成果丰硕,仅列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予以介绍:

(1) 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

首先,刘易斯假设,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资本的应用只能达到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现行工资的程度,工资不等于零。其次,他假设经济中存在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资本主义部门是指经济中使用生产性资本,并因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部门。刘易斯认为资本用于雇人,资本家把资本租给农民。维持生计部门是指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人均产量比资本主义部门低。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的下限,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额通常在 30% 左右。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剩余的使用。资本主义部门因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

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这一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被“吸干”为止(Lewis, 1954)。

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根据MPP(边际生产率)的取值,他们将劳动力的再配置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MPP=0的阶段1, MPP大于0但小于制度工资的阶段2和MPP大于制度工资的阶段3。他们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伪装失业者的转移。在阶段1转移没有困难,因为农业总产出没有减少,而阶段2的转移就有了阻力,由于农业总产出减少,农产品的短缺出现了,农产品价格及工资水平上涨。如果农业部门停滞,工业部门扩张,则劳动力转移越多,工业贸易条件越恶化,劳动力供给曲线越陡,在伪装失业者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即农业部门进入商业化阶段之前,工业部门的扩张就停止了。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同时发展,则可能实现伪装失业者的完全转移,农业部门也可以进入商业化阶段,否则伪装失业者的转移将受阻(Ranis和Fei, 1961)。

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只讨论了存在劳动力剩余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当劳动力剩余消失之后,它就不再适用了。

(2) 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模型提出,工业部门的工资等于边际生产力,而农业部门的工资等于劳动的平均产品,劳动力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剩余”和人口规模,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当农业剩余规模越大,劳动力转移规模也越大,两者同比例增长,即不发达国家一般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构或部门:现代工业部门和落后农业部门。落后农业部门的产量由土地和劳动所决定,生产函数呈收益递减。该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当农业剩余等于零时,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才有可能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农业剩余存在的前提条件下,乔根森又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即农业总产出与人口增长相一致。在这种条件下,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农业剩余的规模将不断扩大,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到工业部门。因此,农业剩余的规模决定着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

但是,乔根森模型仍然忽视了对农业物质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失业等问题。

(3) 托达罗模型

托达罗模型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人口迁移过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作出的反应；只有当一个劳动力估计他在城市部门预期的收入高于他在农村的收入时，迁移才会发生，否则，劳动力将会继续留在农村。因此托达罗认为，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不是实际收入水平而是以实际收入乘以就业概率的预期收入水平。因为劳动力流入城市后能否找到工作还是一个未知数；并且只有当预期收入大于劳动力在农村中的平均收入水平时才意味着劳动力的迁移是有利可图的 (Todaro, 1969)。引入就业概率是托达罗模型最突出的贡献，是对传统人口流动模型的重大修正。传统人口流动模型是假定工业部门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但现实中城市工业部门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托达罗对就业概率的引用和对预期收入差异比较方法的使用，不仅使模型具有不同以往人口流动模型的鲜明特点，同时也使自己的分析有了坚强的现实基础。

托达罗模型强调了如何放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这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相违背；实践证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必须经历一个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

1.2.1.2 第二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既有过剩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有过剩的生产能力，为什么这两种过剩不能结合在一起，这是古典与新古典的剩余经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于是，学者们开始尝试将凯恩斯理论应用于二元经济模型中，拉克西特就是其中的代表。

拉克西特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①商品市场不发达导致的交易障碍；②信贷市场的无组织性，即利率机制的失灵和金融中介机构的缺乏，影响了总需求水平；③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对土地投资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 (Rakshit, 1982)。

拉克西特的两部门模型表明，非农部门的产出水平由农业剩余和城镇工人的农产品消费倾向决定。非农部门的就业水平由城乡居民的工资差异、三个阶级的农产品消费倾向以及农业部门的生产条件决定。当拉克西特将政府部门纳入模型中时，即三部门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政府与地主的消费倾向差异显著时，提高税收水平对非农部门的生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如果政府将大部分税收用于农业发展，则会减少对工业品的消费，减轻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拉克西特模型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在两部门的生产能力、工资率和各个阶级的消费倾向给定的条件下,通过调节自发性支出可以实现均衡。如果政策目标是要使产量与就业最大化,这个均衡的投资水平则是最优的。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最优投资水平不可能很高,即使在一个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中等发达国家,它的最优投资水平也不可能很高。因此,追求产量和就业最大化的短期政策目标和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长期政策目标存在冲突。要解决这一冲突,政府必须改变其他约束条件,例如,限制地主和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在产出和就业不下降的情况下提高资本积累率等。

虽然拉克西特在分析导致发展中国家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时,与凯恩斯的理论有了很大的差异,更进一步地贴近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但是,就发展中国家应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他并未给出更具创建性的、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见解。

1.2.2 农户兼业问题研究

下文将简单回顾西方学者关于农户兼业问题研究的理论发展史,重点梳理东方学界,尤其是中国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包括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兼业效应、土地流转、土地利用和土地产出率等重大关切问题以及国际比较等,最后给出结论性述评与建议。

1.2.2.1 西方学者关于农户兼业的研究

西方学者关于农户兼业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以弗魁奈、杜尔戈、布阿吉尔贝尔等为代表的重农主义“以农为本”理论,以及以斯密、李嘉图、米勒和马尔萨斯等为代表的劳动分工理论,但这里仅述及新古典理论(李娜,2007)。20世纪20—30年代,恰亚诺夫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说”,其核心是“劳动—消费均衡论”。该理论指出,对农户而言,一方面,农田劳动是辛苦而乏味的(劳动的负效用),另一方面,家庭消费需要收入(收入的效用),若这两者之间未实现均衡,即满足基本消费的效用超过劳动的负效用时,继续投入劳动是有利的;反之,一旦达到了均衡,即基本生活需求已得到满足,那么农民就不愿再投入更多的劳动。尽管恰亚诺夫的理论忽视了小农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但是他对小农经济生命力和稳定性的预期是值得肯定的。该理论不鼓励农户兼业,但鼓励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当农户在农业生产中获

得足够消费的产品后就可以不工作了，这为分析现实中的部分农户不进行兼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舒尔茨从分析传统农业特征入手，认为农民在小型、独立和需要计划的私人领域内，考虑生产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将一切活动安排得很有效率，几乎没有一种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舒尔茨重要的贡献是，一改传统理论关于农民是非理性的假设，提出了“理性小农假设”，他认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舒尔茨主张农户理性地配置自己的各类生产要素，在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改善之后，能够相应地将农业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从而为农户兼业提供时间保障；因此，该理论是支持农户兼业经营的。

斯科特提出了“道义小农”理论，他认为“研究小农道德经济，虽然属于经济学范畴，但必须通过对小农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才得以完成”。农民不仅有强烈的互惠观，即他们的经济行为基于道德而不是理性，而且遵循“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他们以获得较稳定的产出为生产决策的标准；只要能保障家庭生计，不惜以平均收益减少为代价。同时，处于维持生计边缘的小农，对安全的偏好高于利益；当一项新技术既有较高的收益期望值，又存在收益的不确定性时，小农总是选择风险小收益确定的生产技术，即使收益很低。如果一个社会中宗教、文化和道德等传统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乃至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利润最大化就不一定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该理论是解释宗教和传统文化色彩很浓的国家农户兼业行之有效的方法。

贝克尔提出以家庭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通过农户模型，他将家庭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农户家庭的生产行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家庭成员将时间配置到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等，以及配置到市场工作和非市场工作等，于是，便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市场效率高的家庭成员将更多的时间投入非农业部门，而家庭生产效率高的家庭成员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农业部门或家务劳动中。农户将劳动力资源配置到农业与非农业部门，本质上是为了扩大家庭收入的来源，是农户兼业的基本动因。但是，理论基于农户生产和消费的可分性假设，由于该假设成立的条件^①过于苛刻而难以满足，理论也因此而

^① 可分性的前提条件：1) 劳动力与其他农业投入以及产出市场是完全竞争的；2) 家庭劳动和雇佣劳动在生产上可以完全替代；3) 非农工作不存在效用损失 (Skoufias, 1994)。

遭到质疑。

上面是西方学者对农户兼业研究的经典理论，以下将阐述东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界的研究现状。

1.2.2.2 主流学派

理论研究可划分为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前者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后者基于古典经济学^①。其中，新古典理论的核心是资源配置。主流学派认为，兼业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发展的共同特征，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在利用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和增加农户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未达到规模经济的理想状态。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等为代表。日本农户兼业在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作用显著，但是，与美国相比，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究其原因，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认为是小规模生产所致，即不能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节约劳动力的大型机械。1961年，日本颁布了《农业基本法》，旨在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和促进土地集体经营等，但该农业结构改革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大多数分散农户不愿离开农业的所谓“二兼户滞留”现象依然存在。速水佑次郎等认为导致兼业化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①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户兼业机会增加；②小型机械的使用减轻了劳动强度，使得即使没有青壮年劳动力，依靠老年人和妇女也能维持农业生产；③人均寿命的延长（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

国内许多学者也对农户兼业化进行了研究。姚洋（1998，1999）、Yao（2000）和Kung（2002）等的研究表明，农民非农就业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农地的流转，较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能产生更多的土地租赁，土地的自由流转又具有交易收益效应和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从而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其隐含的逻辑关系是：专业化分工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农户兼业化则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土地产出率和土地利用率。因此，在效率机制作用下，农民非农就业将促进农地的流转，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黄大学，2006）。但是，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以及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并没有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加速而提高，而是家庭成员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和妇女则留在家中从事农业生产，呈现出“半工半耕”或“男工女耕”的农户

^① 1.2.2.1 给出的西方经典理论应属于主流学派。

兼业化特征(钱忠好, 2008)。农户兼业虽然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但却是理性的, 其产生的原因在于: ①人多地少, 加之农业增长方式由劳动集约型向资本和技术集约型转变, 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 边际生产率降低; ②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 ③均分性的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 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 土地的价值也随之提高, 农民对土地的转让比较谨慎。董智明和王建红(2004)、梅建明和何新民(2003)及高强(1999)等在肯定农户兼业化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的同时, 认为它只是一种过渡形态, 应该向农业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转变。总之, 国内诸多学者的观点基本上与速水佑次郎等的一致。

在新古典框架下, 资源配置问题位于研究的核心地位, 因而对于与分工相联系的一系列有趣现象的分析就力不从心, 这使得其分析方法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杨小凯, 2003)。

1.2.2.3 非主流学派

非主流学派基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其核心是著名的斯密定理, 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 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运输条件, 其中“运输条件”实际上是交易费用思想的雏形(Smith, 1776)。近年来兴起了基于分工视角的超边际分析, 为农户兼业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和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如向国成和韩绍凤(2005)认为, 在人地矛盾比较尖锐和农村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的约束下, 农户兼业化必然是农户家庭内分工的长期组织均衡形态, 兼业在本质上是家庭成员个体层面的专业化与家庭整体层面的专业多样化的统一, 引致了迂回经济的发展, 催化了农民组织化的演进, 促进了农民个体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小农经济效率的提高。向国成和韩绍凤(2007)还扩展了间接定价理论模型, 并运用它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组织化的演进路线^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显然, 向国成和韩绍凤的研究一改主流学派的传统思路, 在农业组织化和兼业出路等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但是, 如果将农户兼业与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团队化联系起来考察, 可能会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周晔馨, 伍琴, 2009)。周晔馨(2007)则在分工—交易效率理论框架下研究了农户兼业, 分别阐释了农户家庭内部和家庭间的兼业分工模型; 并进一步放宽假设, 考虑了受

① 即集体经济→家庭经营→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团队化。